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97期）

如何应对中国产业内卷式竞争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5年1月



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机制 体制与治理模式

报告人：张杰
2025年1月8日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其中，首次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重点改革任务。

本次研究报告聚焦和讨论的问题是：

- 1、如何看待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重要表现与内在特征？其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具体影响？**
- 2、如何理解中国“内卷式”竞争在政府和企业层面的核心影响因素？尤其要关注其中的重要机制体制性因素。**
- 3、如何探寻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有效治理模式？如何找到相应的具体改革举措？**

一、如何看待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重要表现与内在特征

首要需要搞清楚的核心概念是，中国“内卷式”竞争，究竟“内卷”的是什么？

——内卷的是价格，或者说是部分行业内企业生存和发展策略，普遍依赖的是“低价”、“杀价”行为、甚至是“无法获得正常市场平均利润率”、“难以积累创新研发能力”式的低价格竞争策略。

其次需要搞清楚的是，中国“内卷式”竞争，究竟对维护“正常”市场竞争秩序或者是中国“有效市场”的发挥，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中国部分行业普遍发生甚至逐步固化的具有“囚徒困境”式的“竞赛竞争”格局（race to the bottom competition）。

依据研究团队的长期实地调研和深入观察，在我们看来，可将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核心内涵和内在特征，归纳为如下方面的典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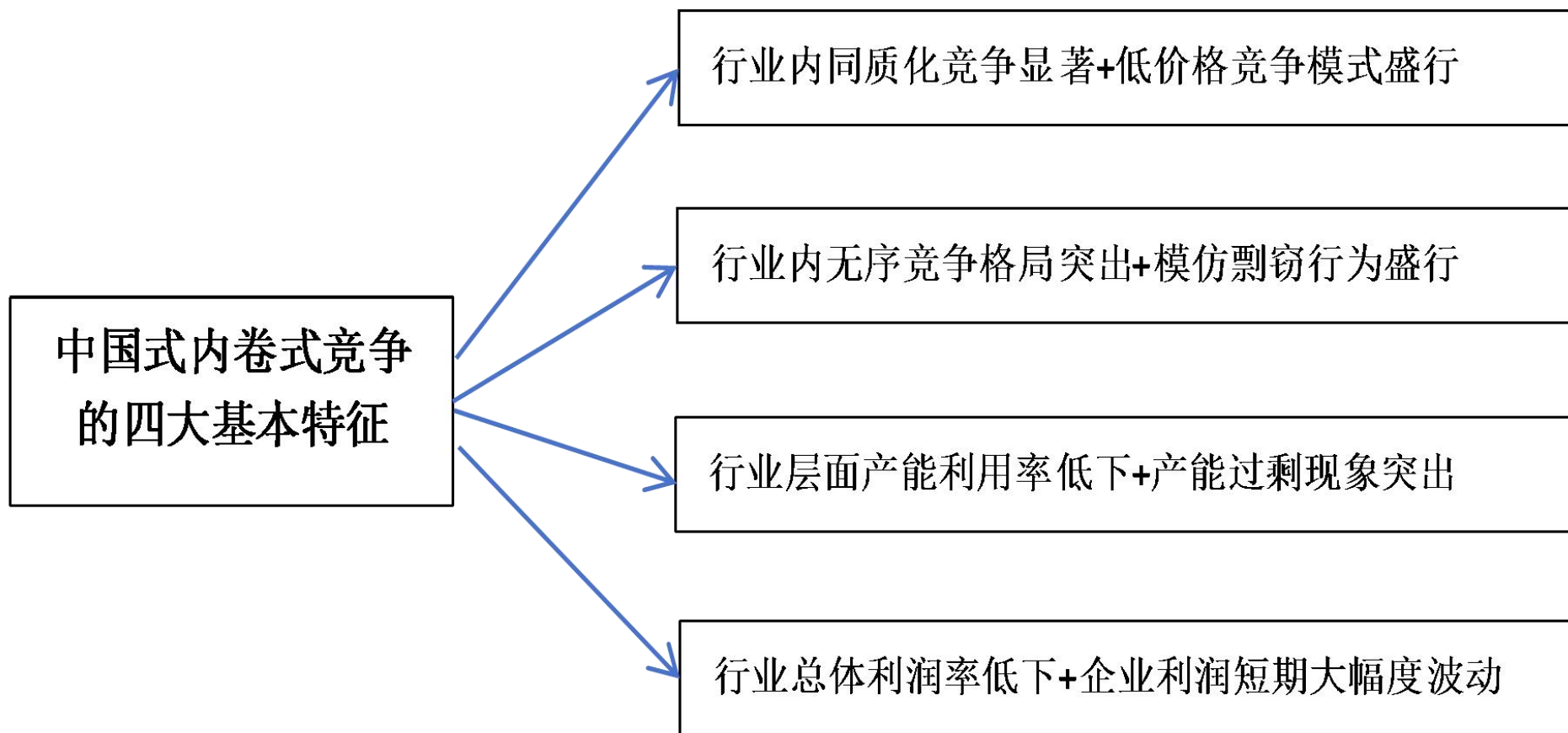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四大核心特征分析框架

第一，“同质化竞争显著+低价格竞争模式盛行”

——中国同质化竞争行为不仅仅已经在传统行业领域根深蒂固，也日益蔓延到部分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

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中国以新能源汽车、锂动力电池、光伏产品这“**新三样**”行业领域，均程度不等地呈现出显著的同质化竞争特征。

集中体现在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各级政府竞相通过制定各类政府发展规划和实施各种产业优惠政策，将这新三样产业设定为地区内的主导产业和优先发展产业，最终结果是造成了中国各地区之间“新三样”行业的同质化竞争现象。

同质化竞争不仅仅是中国产业竞争格局之中的某种突出现象，实质上是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特色产业发展的政府干预机制体制问题**，已经演化成为影响中国高质量发展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

“新三样”行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结果触目惊心：

——2017年中国新能源车企超过了487家，2024年仍然有40多家了，400多家车企在过去6年时间内得到淘汰。最终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数量可能会维持在3-5家左右。

——2024年中国锂动力电池的总产能为890GWh，同比增长16%
同期，锂电上游碳酸锂价格持续大跌，年度跌幅超过25%。

——2024年是光伏行业挣扎的一年，也是“反内卷”的一年。产业链价格持续下探，硅料、硅片、电池片及组件等各环节价格均大幅下跌，如组件被杀价到六毛多每瓦，供需错配矛盾突出，企业盈利空间压缩，光伏企业新一轮洗牌加速，不少中小企业不堪重负宣告破产，问题公司纷纷退市，跨界企业黯然离场。

第二、“行业内无序竞争格局突出+企业之间模仿剽窃行为盛行”

——依据我们的长期实地调研和深入观察，可以将中国多数行业内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行为模式，归纳为典型的“一哄而上”或者“原子式”竞争模式，即一旦某个领先企业开发开拓了某种新产品或商业模式盈利机会，大量企业和资本采取针对领先企业产品或商业模式的模仿和剽窃行为，迅速进入到该行业或该产品领域争夺快速增长的市场机会和行业短期的盈利机会。

迫使中国多数行业之中陷入到“行业内无序竞争格局突出→企业之间模仿剽窃行为盛行→企业研发投入能力弱化→行业同质化竞争状态强化固化→行业有序市场秩序缺位”的恶性循环模式。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部门领域，或者是民营企业 and 中小微之间，甚至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均程度不等地发生着无序竞争现象，企业之间模仿剽窃行为盛行，难以彻底有效根治。

第三、“行业层面产能利用率低下+产能过剩现象突出”

——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的结果，在部分行业造成了难以忽视的产能利用率低下和短期产能过剩现象。

2024年前三季度产能利用率较低的行业是：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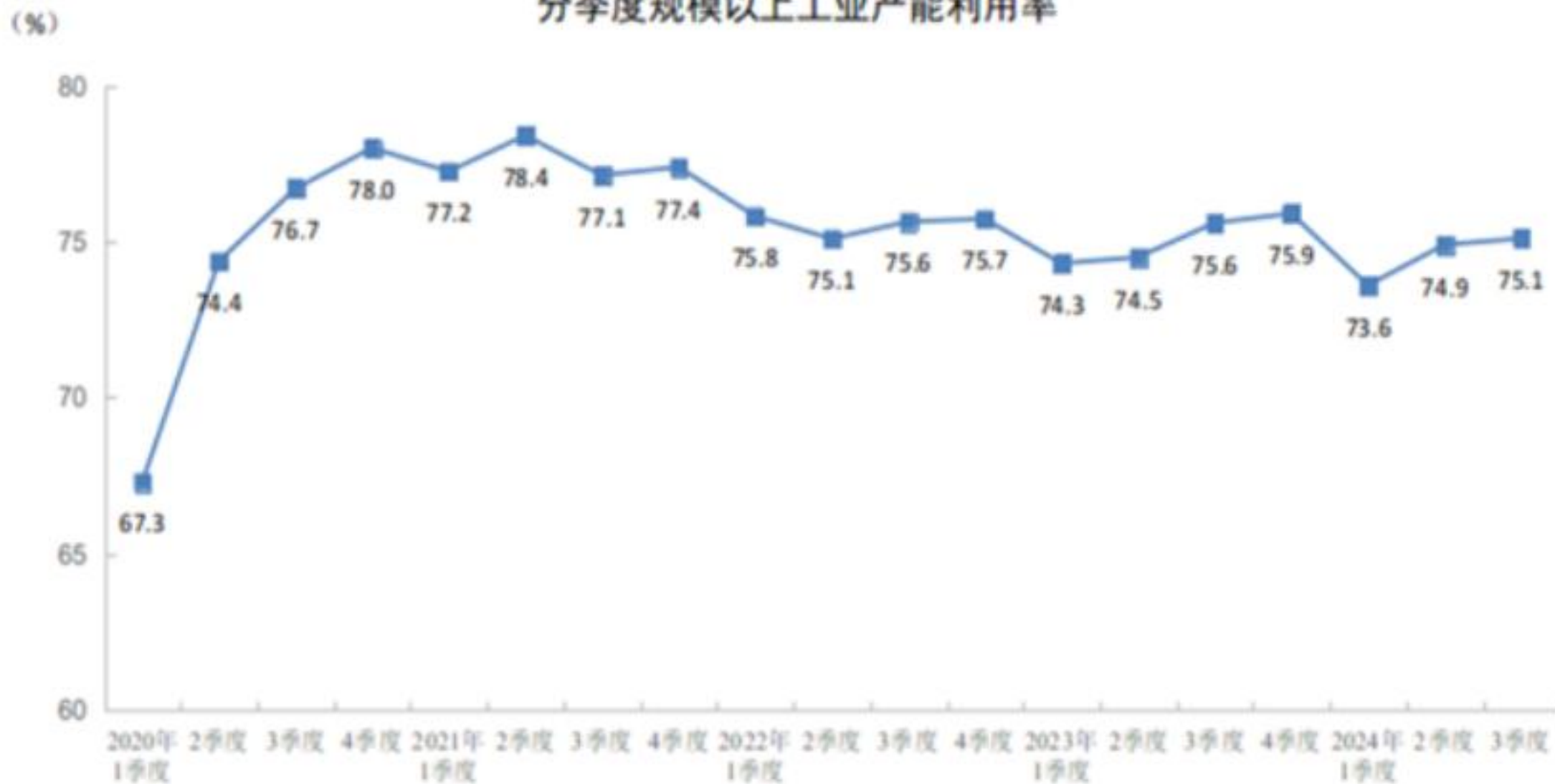
食品制造业（70.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72.7%）（国有企业集中部门）

汽车制造业（73.2%）

医药制造业（73.8）

分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



2024年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

行业	三季度		前三季度	
	产能利用率 (%)	比上年同期增减 (百分点)	产能利用率 (%)	比上年同期增减 (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	75.1	-0.5	74.6	-0.2
其中：采矿业	74.6	-0.8	75.2	0.1
制造业	75.2	-0.6	74.8	-0.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4.3	0.1	72.3	-0.2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72.7	-1.1	72.3	-1.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90.2	-1.0	91.3	0.2
食品制造业	70.7	-0.4	69.5	-0.4
纺织业	77.9	1.0	78.3	1.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76.0	1.4	76.3	1.5
医药制造业	73.8	1.1	75.1	0.3
化学纤维制造业	85.5	0.4	85.4	1.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1.7	-3.3	62.6	-2.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7.4	-1.7	78.2	-0.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8.4	-1.8	78.6	-0.8
通用设备制造业	78.7	0.0	78.8	-0.4
专用设备制造业	75.8	-1.7	76.4	-1.1
汽车制造业	73.2	-2.4	70.3	-3.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75.6	-2.2	74.4	-2.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77.9	1.4	76.3	1.3

在我们看来，并不能将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直接等同于产能过剩概念，二者既有表面现象的相同之处，更有深层次形成机制方面的本质性差异特征。

——即便在某些行业内没有明显发生产能过剩现象的前提下，甚至在某些行业仍然维持一定较高水平产能利用率的情形下，仍然发生了典型的行业内卷式竞争现象。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根据中国铝业2024年半年报，截至2024年6月底，全球原铝产能利用率为91.3%，其中，中国原铝产能利用率约为**95.6%**。这个数值比中国铝业2024年原铝产能利用估算值106%要低一些。

中国电解铝行业虽然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和成本优势最为显著的领先行业，但是，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和无序市场竞争格局问题并未得到彻底有效治理，突出表现在行业获得的整体长期利润总额并未达到全球合理水平的重要现象。

2024年11月，中国电解铝行业即时理论生产总成本（含税）21030.02元/吨，即时利润亏损527.02/吨，**亏损产能占比达到65.83%**。

第四、“行业总体利润率低下+企业利润短期大幅度波动”

——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的具体表现，可以提炼和归纳为“卖得越多、越不挣钱”的核心特征事实和典型现象。

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的核心特征，表面上来看，表现为行业内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格局和同质化竞争状态，甚至表现为产能利用率下滑和局面领域短期产能过剩现象的发生，但是，从深层次来看，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的核心特征，应该集中反映在行业总体利润率低下和企业利润短期大幅度剧烈波动现象。

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所集中表现出来的“企业利润短期大幅度波动+行业总体利润率低下”领域基本特征，是识别和判断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的根本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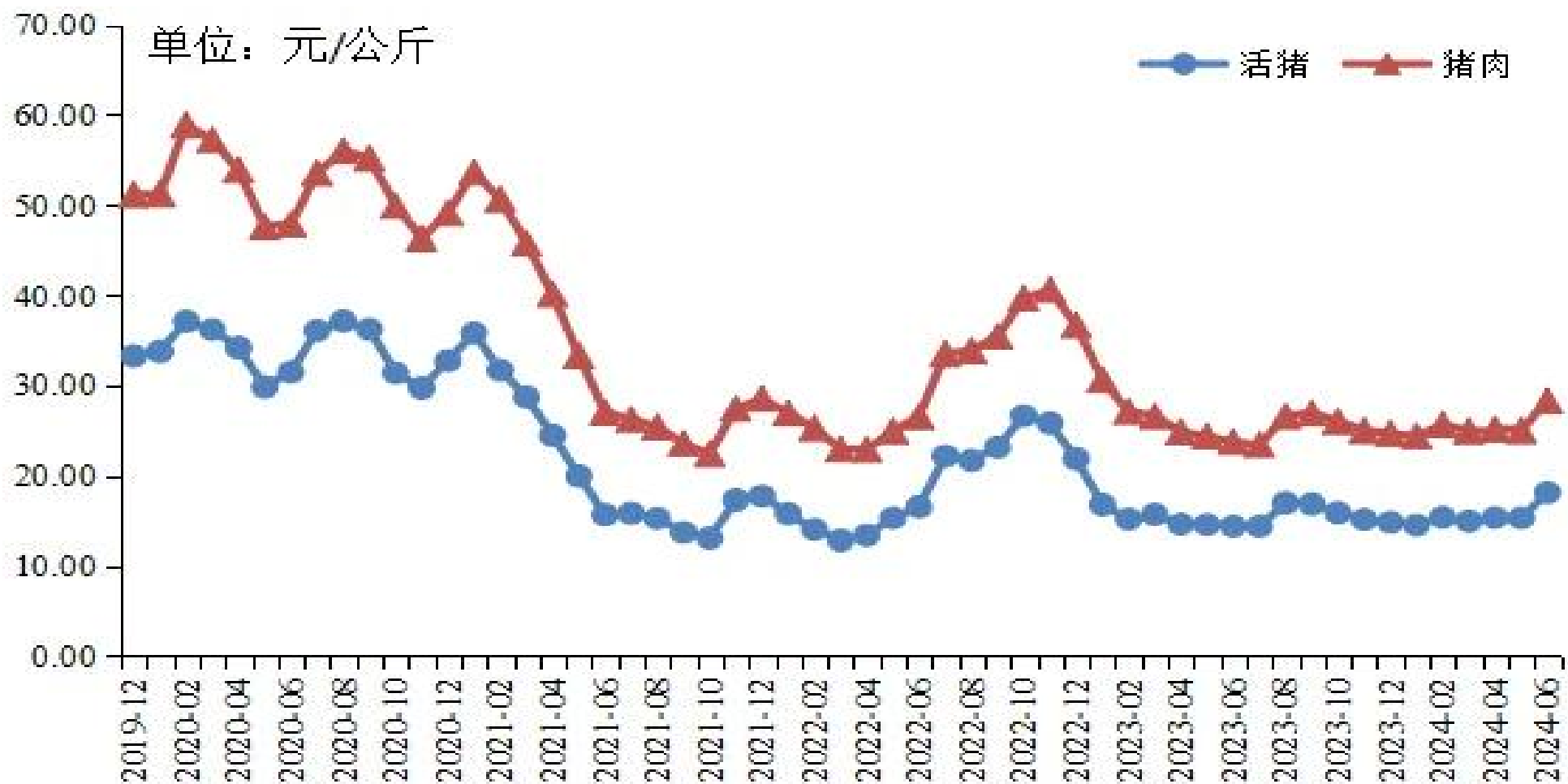


图 1-1. 活猪及猪肉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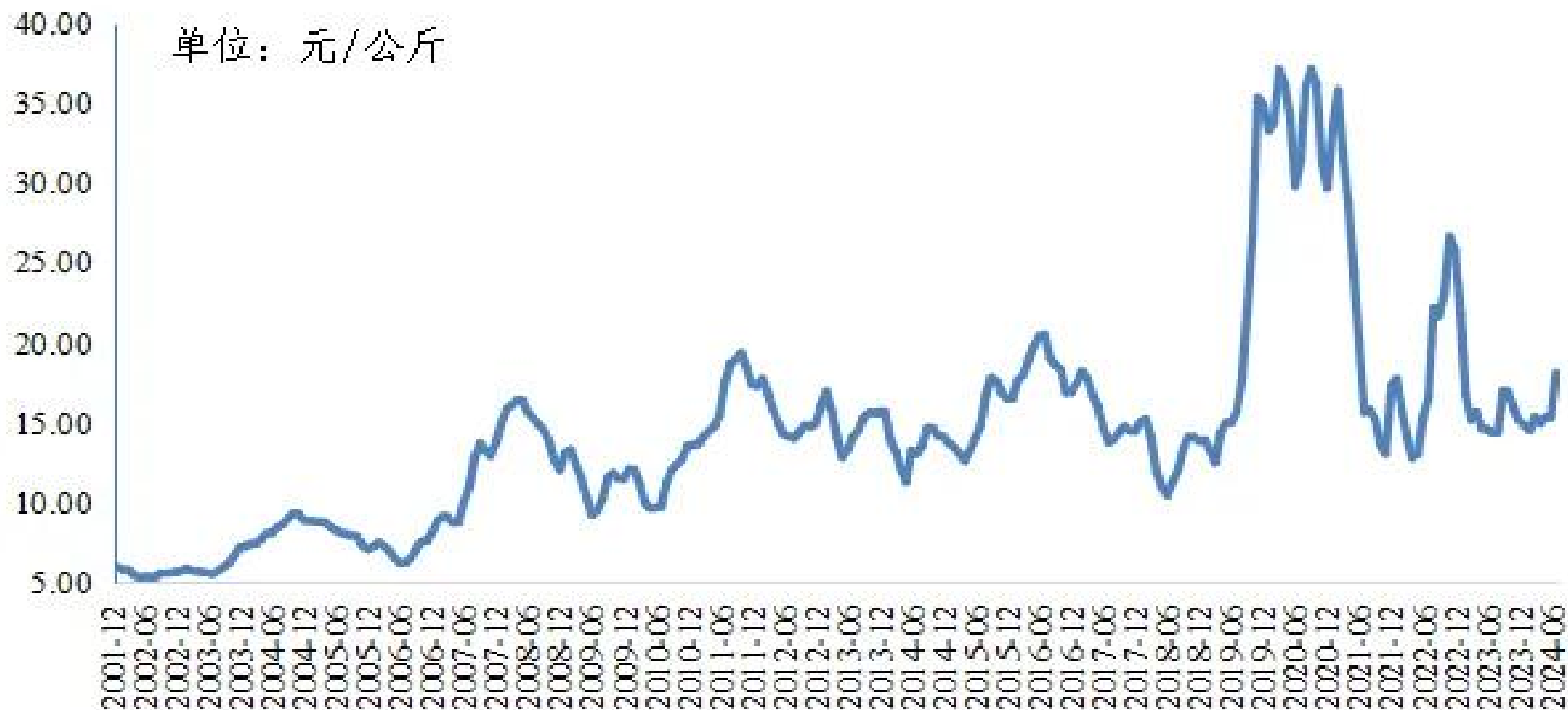


图 1-2. 集贸市场活猪价格历史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

二、如何理解中国“内卷式”竞争形成背后的政府干预逻辑与突出机制体制因素

第一，各级各地政府竞相实施的以财政资金补贴为主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产业培育扶持政策等手段，是导致中国多数行业内卷式竞争机制产生的核心原因。

——中国各级各地政府遵循“由上到下”逻辑的产业发展规划模式，是诱发同质化竞争的核心因素。

而多数地方政府谋划和布局地区新产业，基本上是完全遵循甚至照搬国家规划从国家层面所布局的新兴产业，强调和突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的坚决执行和具体落实。

部分中西部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也在纷纷制定发展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新兴产业，比如，山西某个地级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推动智能驾驶产业发展，完全不具备各项产业基础条件。

——地方政府的各类巨额财政补贴，降低了企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尤其是降低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投资和盈利的不确定性和未来风险，这就会诱使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乃至金融资本快速进入到这些政府引导和鼓励发展的各项新兴产业领域，刺激了中国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同质化竞争格局的形成。

——针对长期经营不善企业和处于亏损状态企业的持续性巨额财政资金补贴，表面上是保住了地方短期就业和GDP，最终结果必然会严重干预和扭曲了正常市场竞争机制的运行机制，突出表现在对经营不善企业和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企业市场退出和破产机制的严重干扰。

第二，中国部分行业企业陷入到依赖短期内尽快实现“规模经济—低成本优势”竞争模式陷阱，导致了中国“内卷式”竞争机制的形成。

——从中国企业之间竞争行为的内在逻辑来看，并不是通过前期巨额研发投入来创造企业自身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从而形成基于企业研发投入所造成的产品差异化特征的垄断竞争性格局，相反，而是普遍陷入到依靠谁比谁更快实现、更能实现规模经济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低成本优势主导的“规模经济—低成本优势”竞争模式陷阱。

——针对先发企业或领先企业而言，核心竞争策略是尽快通过自身产能规模扩张，优先构建起在市场竞争中的绝对产能规模优势，依靠企业绝对领先的低成本绝对优势来营造强大的市场进入壁垒，阻止其他企业的竞争追赶和市场进入。而针对后发企业或落后企业而言，与先发企业或领先企业仍然比拼的是谁的产能规模更大，产能规模越大意味着企业自身的绝对成本相对较低，就可以通过低价格竞争策略实现对领先企业既有市场竞争优势的赶超。由此，可以断定，中国部分行业已经陷入到“规模经济—低成本优势”囚徒困境式的纳什均衡模式。

第三， 知产产权保护和执行制度自身存在的多重缺陷， 是驱动中国 “内卷式” 竞争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中国在专利、 商标等领域的知识产权执行方面存在多重制度性缺陷问题， 具体表现在：

——异地起诉行为通常由于被起诉企业在当地所拥有的关系网， 或者是由于司法过程中各种显性或隐性地方保护主义， 使得被侵权企业的裁决和赔偿诉求通常难以在有效时期内得到真正落实。 即便被侵权企业赢了官司， 但是， 也难以在有效期内获得有效赔偿， 极大地挫伤了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法的信任和使用；

——即便不存在知识产权司法活动中的关系网或者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然而， 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往往存在认定难取证难、 侵权损害认定弹性大、 赔偿金额不确定以及赔偿金额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 更有甚者， 侵权企业往往会聘请律师拖延认定和裁决时间， 造成被侵权企业往往要花费大量人力、 财力和时间来应对各种法律程序， 极大地挫伤了被侵权企业依靠法律途径来保障自身利益的行动动机。

特别是针对那些创新性中小规模企业， 更是难以支付如此巨额成本来合理主张和捍卫自身的知识产权权力。

第四，全球价值链体系所蕴含的独特治理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内卷式”竞争格局形成。

倘若按照一般逻辑来理解，中国全面参与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性，使得中国本土企业能够利用更为庞大的国外需求市场构建规模经济优势，中国本土企业对国外需求市场的积极开拓和渗透，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企业在国内市场所面临的同质化竞争行为和低价格竞争行为，进而成为缓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外部机制。

依据我们的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和贸易体系以及蕴含的利益分配机制，非但没有成为缓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外部机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助推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机制。

——多数处于创新研发劣势和技术劣势的中国本土企业被动地集中那些产业链供应链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配环节，被迫集中在市场进入门槛和技术壁垒较低的行业和环节领域，难以避免地成为刺激中国国内行业本土企业之间“内卷式”竞争机制形成的重要因素。

——针对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所需要的国外核心原材料关键零配件和国外产品订单，均倾向于采取垄断价格效应和纵向价格压榨效应策略，采取外包订单的企业分散竞争策略和强迫外包订单采购价格逐年压低策略，试图迫使中国的出口本土企业长期被限制或者压制在依赖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轨道之中。这显然是造成中国出口部门本土企业同质化竞争格局形成和低价格竞争策略盛行的重要因素。

以中国纺织业为例：

2024年1月至9月，中国纺织服装累计出口2224.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0.5%，其中纺织品出口1043亿美元，**增长2.9%**，服装出口1181.1亿美元，**下降1.6%**。

2024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了价值1350亿美元的纺织品和服装，较上年略有下降2%。尽管出现下滑，但中国纺织业仍是全球市场的主导力量，占全球纺织品出口的**30%以上**。

产品	金额（人民币）	同比增长	占比
机电产品	7.14万亿元	8.20%	58.90%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6837.7亿元	10.30%	-
集成电路	5427.4亿元	25.60%	-
汽车	3917.6亿元	22.20%	-
手机	3882.8亿元	-1.70%	-
劳密产品	2.07万亿元	6.60%	17.10%
服装及衣着附件	5244.3亿元	3%	-
纺织品	4079.3亿元	3.70%	-

2024 年 1—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分组	亏损面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	同比(%)	同比(%)	同比(%)
工业企业	——	1.8	2.3	-4.7
制造业	——	1.9	2.3	-4.6
纺织行业	23.2	4.2	4.0	9.0
棉纺织业	23.9	0.7	0.6	-17.9
其中：棉纺纱	26.0	-1.4	-1.5	-29.0
棉织造	20.4	4.8	4.7	-5.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4 年 1—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

分组	营业收入 利润率	每百元营 业收入中 的成本	每百元资产 实现的营业 收入	资产负债率	产成品存货 周转天数	应收账款平 均回收期
	1—11 月 %	1—11 月 (元)	11 月末 (元)	11 月末 (%)	11 月末(天)	11 月末(天)
工业企业	5.40	85.34	77.7	57.9	19.8	66.7
制造业	4.54	85.88	90.0	57.4	22.1	68.3
纺织行业	3.56	88.46	99.6	60.0	34.3	50.0
棉纺织业	1.92	91.03	92.1	62.7	39.0	46.2
其中：棉纺纱	1.37	92.01	88.6	66.8	37.4	38.0
棉织造	2.90	89.24	99.1	54.5	42.0	61.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争论的问题：“内卷式”竞争能否对中国塑造全球竞争优势领先的制造业产生正向激励作用

中国特定行业的产能快速扩张与全球竞争优势的快速建立，是与中国内卷式竞争效应密切相关的。可将之描述为“中国内卷式竞争→行业和企业层面规模经济快速形成→确立全球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优势→全球市场占有率快速上升→确立中国产业的全球独一无二规模竞争优势”的发展逻辑。

一旦企业在国内市场确立了低成本市场竞争优势，就必然会诱使这些企业利用国内低成本优势转向全球市场的快速渗透和扩张，进而逐步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所蕴含的独特规模经济及其背后的全球独一无二低成本优势，确立中国产业和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中国企业和产业一旦确立了全球低成本竞争优势，就会相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牢牢树立这种源自于产业链供应链外部规模经济和企业自身内部规模经济共同构成的低成本优势，成为支撑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难以被替代和超越竞争优势源泉的核心力量。

第五，部分居民群体真实收入水平增长乏力乃至最近部分居民群体真实收入水平下滑，所带来的国民消费信心不足和消费能力下降，是激化当前中国“内卷式”竞争现象加剧的重要因素。

当前，中国发生了显著的消费层次降低重大现象，消费层次降低刺激了部分消费者对价格较低产品的巨大需求，传导到部分行业部门，激发了行业企业内的“低价格”、“低成本”主导的生产模式和市场竞争模式，加剧了中国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

重新审视为什么“拼多多”等平台在当前中国快速扩张的驱动机制。

——公务员普遍降薪、国有企业大面积降薪、金融部门从业人员大幅度降薪，影响了国内至少6000万群体的中高收入群体的未来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实地调研发现，至少2亿低收入群体和打工群体的真实收入，在2023年和2024年期间发生了显著下降的现象。

例如，重庆市相对较低层次打工群体（服务业）的月薪，由疫情前的3000多元，普遍降低到疫情后的3000元以下。

三、如何探究破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有效治理模式与重点改革举措

第一，正确理解和把握“有为政府”的合理边界

治标要治本：针对政府由正向激励效应转向负面激励效应的各类产业政策进行实施重构式调整 and 改革，弱化和消除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孕育和刺激机制体制土壤。

逐步全面取消各级各地政府对以税收返还和财政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倒逼和促进各地区政府，形成遵循以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与自身产业基础、要素禀赋条件、科技创新资源相适应、相匹配的特色优势产业和产业链为导向的发展政策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原则。

鼓励地方政府将各类产业政策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周期”领域调整转型，向支持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大幅度调整和转型，尤其向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的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领域的转移和倾斜。

第二，全面确立和推进“有效市场”基础性作用，

真正确立和激活市场竞争机制，这是解决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根本。

打破部分行业内企业之间盛行和固化的“一味依赖规模经济+偏好依赖低价格竞争模式”的纳什均衡状态，通过激励企业主动依靠“长周期巨额研发投入+高成本人力资本”能力所形成的企业差异化市场竞争优势源泉，作为企业和产业的核心市场进入壁垒，来创造和强化企业和产业层面的合理市场进入壁垒，将之设定为遵循市场竞争逻辑的破解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格局的主要手段。

不可忽略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已经形成的特定利益激励相容机制，要消除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激励机制，就是要限制和消除各级政府利用不合理的产业政策干预手段，对企业，

第三，促进行业自发合作秩序的形成

促进重点行业内“大中小企业有序合理分工协作”为导向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体系的加速形成。为导向的中国特色优势新型产业组织和市场竞争关系的形成，将之设定为遵循市场竞争逻辑的破解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格局的重要手段。

从政府和行业层面逐步扭转和弱化一味强调和依赖“大而全”、“大就是强”、“大就是优势”的固有发展思维，强调和突出“小而精”、“专即强”“集群就是优势”的新型发展思维

确立大中小企业依据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分工协作形成产业体系竞争优势的新型发展思路，引导国家和地方层面将培育和壮大以龙头企业、主导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企业、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配套企业、关键材料企业、关键工艺企业、一般配套企业之间新型分工协作关系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设定为政府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的核心目标。

尤其要促进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之间依据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协作关系形成的新型关系。

第四，推进规范产业的基础制度层面重大改革举措

中国行业发展到了依靠企业破产重组和兼购合并为主的发展时期，这将深刻影响和重塑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格局

——加快推进企业破产制度层面的基础性政策改革和落实。针对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难”、“破产贵”、“破产不了”的困局，特别是针对那些由于牵涉国有资产流失、银行贷款清偿、官员个人投资资产利益关系，各类债权人债务清理清偿以及个人清偿资产科学界定和查处等一系列问题，造成民营企业和非有限责任性质企业“想破产难以破产”、“拖着无法破产”等难题，尽快推进企业破产法和个人破产法领域的制度调整 and 改革。

——切实降低知识产权执行和落实领域的各项制度性交易成本。针对各类专利、商标、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领域频繁发生的异地诉讼难、异地查证难、异地执行难、异地赔偿难等难题和顽疾，真正强化全国巡回知识产权法院在跨区域司法执法的主导作用和核心功能；针对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微企业，难以承担依靠各类知识产权保护司法执法机制来保障自身利益的进程之中，普遍存在的时间成本太高、腐败寻租成本较高、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等顽疾，要提出针对性解决政策思路。

第五，重视外部经济约束条件的支撑作用

重视和尊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之中，所存在的“收入结构→需求结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市场竞争结构”的基本经济规律

科学认识当前中国“内卷式”竞争格局的形成，是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之中处于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的旧产业部门，向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新产业部门转型升级的特殊时期密切相关。必将随着中国经济部门之中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新产业部门扩张和壮大，所蕴含的对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性推动作用，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中国“内卷式”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身经济发展进程之中的阶段性现象，需要科学认识到这个根本性的决定性经济规律，不可操之过急地试图短期加以彻底解决。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聚焦“内卷式”竞争，CMF专题报告发布

1月8日，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97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如何应对中国产业内卷式竞争”，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杨瑞龙、毛振华、刘志彪、滕泰、罗志恒、张杰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张杰代表论坛发布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202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其中，首次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重点改革任务。围绕这一重要的研究命题，本次研究报告聚焦和讨论的问题是：

一、如何看待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重要表现与内在特征？其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具体影响？

二、如何理解中国“内卷式”竞争在政府和企业层面的核心影响因素？尤其要关注其中的重要机制体制性因素。

三、如何探寻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有效治理模式？如何找到相应的具体改革举措？

一、如何看待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重要表现与内在特征

首先，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核心是价格，即部分行业内企业生存和发展策略，普遍依赖的是“低价”、“杀价”行为、甚至是“无法获得正常市场平均利润率”、“难以积累创新研发能力”式的低价格竞争策略。其次，在中国“内卷式”竞争背景下，中国部分行业普遍发生甚至逐步固化的具有“囚徒困境”式的“竞次竞争”格局（race to the bottom competition）。

依据研究团队的长期实地调研和深入观察，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核心内涵和内在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同质化竞争显著和低价格竞争模式盛行。中国同质化竞争行为不仅仅已经在传统行业领域根深蒂固，也日益蔓延到部分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中国以新能源汽车、锂动力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行业领域，均程度不等地呈现出显著的同质化竞争特征。**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还是东北地区，各级政府竞相通过制定各类政府发展规划和实施各种产业优惠政策，将新三样产业设定为地区内的主导产业和优先发展产业，最终造成了中国各地区之间“新三样”行业的同质化竞争现象。

同质化竞争不仅是中国产业竞争格局之中的某种突出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特色产业发展的政府干预机制体制问题，已经演化成影响中国高质量发展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2017年中国新能源车企超过487家，2024年有40多家，400多家车企在过去6年时间内淘汰，最终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数量可能会维持在3-5家左右。2024年中国锂动力电池的总产能为890GWh，同比增长16%。同期，锂电上游碳酸锂价格持续大跌，年度跌幅超过25%。2024年是光伏行业挣扎的一年，也是“反内卷”的一年。产业链价格持续下探，硅料、硅片、电池片及组件等各环节价格均大幅下跌，如组件下降到六毛多每瓦，供需错配矛盾突出，企业盈利空间压缩，光伏企业新一轮洗牌加速，不少中小企业不堪重负宣告破产，问题公司纷纷退市，跨界企业黯然离场。

第二，行业内无序竞争格局突出和企业之间模仿剽窃行为盛行。依据我们的长期实地调研和深入观察，可以将中国多数行业内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行为模式归纳为典型的“一哄而上”或者“原子式”竞争模式，即一旦某个领先企业开发开拓了某种新产品或商业模式盈利机会，大量企业和资本采取针对领先企业产品或商业模式的模仿和剽窃行为，迅速进入到该行业或该产品领域争夺快速增长的市场机会和行业短期的盈利机会。中国部分行业陷入到“行业内无序竞争格局突出→企业之间模仿剽窃行为盛行→企业研发投入能力弱化→行业同质化竞争状态强化固化→行业有序市场秩序缺位”的恶性循环模式。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部门领域，或者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之间，甚至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均程度不等地发生着无序竞争现象，企业之间模仿剽窃行为盛行，难以彻底有效根治。

第三，行业层面产能利用率低下和产能过剩现象突出。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在部分行业造成了难以忽视的产能利用率低下和短期产能过剩现象。2024年前三季度产能利用率较低的行业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61.7%）、食品制造业（70.7%）、煤炭开采和洗选业（72.7%）

（国有企业集中部门）、汽车制造业（73.2%）、医药制造业（73.8）。

但是，并不能将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直接等同于产能过剩概念，二者既有表面现象的相同之处，更有深层次形成机制方面的本质性差异特征。即便在某些行业内没有明显发生产能过剩现象的前提下，甚至在某些行业仍然维持一定较高水平产能利用率的情形下，仍然发生了典型的行业内卷式竞争现象。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根据中国铝业2024年半年报，截至2024年6月底，全球原铝产能利用率为91.3%，其中，中国原铝产能利用率约为95.6%。中国电解铝行业虽然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和成本优势最为显著的领先行业，但是，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和无序市场竞争格局问题并未得到彻底有效治理，突出表现在行业获得的整体长期利润总额并未达到全球合理水平。2024年11月，中国电解铝行业即时理论生产总成本（含税）21030.02元/吨，即时利润亏损527.02/吨，亏损产能占比达到65.83%。

第四，行业总体利润率低下和企业利润短期大幅度波动。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的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卖得越多、越不挣钱”。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的核心特征，表面上来看，表现为行业内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格局和同质化竞争状态，甚至表现为产能利用率下滑和局面领域短期产能过剩现象的发生。但是，从深层次来看，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的核心特征集中反映在行业总体利润率低下和企业利润短期大幅度波动。

信号是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预期表达了越来越强的信心。9月26日的表述为“努力完成”，到了12月9日，表述变为“将顺利完成”，再到12月12日，进一步明确为“定能完成”。这些变化表明，中央对于完成本年度及下一年度的经济任务持有坚定态度，**强调稳定增长是当前中央层面的首要任务。**

二、如何理解中国“内卷式”竞争形成背后的政府干预逻辑与突出机制体制因素

第一， 各级各地政府竞相实施的以财政资金补贴为主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产业培育扶持政策等手段，是导致中国多数行业内卷式竞争机制产生的核心原因。中国各级各地政府遵循“由上到下”逻辑的产业发展规划模式，即多数地方政府谋划和布局地区新产业，基本上是完全遵循甚至照搬国家规划从国家层面所布局的新兴产业，强调和突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的坚决执行和具体落实。部分中西部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也在纷纷制定发展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新兴产业，比如，山西某个地级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推动智能驾驶产业

发展，但其完全不具备产业基础条件。

地方政府的各类巨额财政补贴，降低了企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尤其是降低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投资和盈利的不确定性和未来风险，这就会诱使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乃至金融资本快速进入到这些政府引导和鼓励发展的各项新兴产业领域，刺激了中国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同质化竞争格局的形成。并且，针对长期经营不善企业和处于亏损状态企业的持续性巨额财政资金补贴，表面上保住了地方短期就业和GDP，最终必然会严重干预和扭曲了正常市场竞争机制的运行机制，突出表现在对经营不善企业和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企业市场退出和破产机制的严重干扰。

第二，中国部分行业企业陷入到依赖短期内尽快实现“规模经济-低成本优势”竞争模式陷阱，导致了中国“内卷式”竞争机制的形成。从中国企业之间竞争行为的内在逻辑来看，并不是通过前期巨额研发投入来创造企业自身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从而形成基于企业研发投入所造成的产品差异化特征的垄断竞争性格局。相反，而是普遍陷入到依靠谁比谁更快实现、更能实现规模经济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低成本优势主导的“规模经济-低成本优势”竞争模式陷阱。

针对先发企业或领先企业而言，核心竞争策略是尽快通过自身产能规模扩张，优先构建起在市场竞争中的绝对产能规模优势，依靠企业绝对领先的低成本绝对优势来营造强大的市场进入壁垒，阻止其他企业的竞争追赶和市场进入。而针对后发企业或落后企业而言，与先发企业或领先企业仍然比拼的是谁的产能规模更大，产能规模越大意味着企业自身的绝对成本相对较低，就可以通过低价格竞争策略实现对领先企业既有市场竞争优势的赶超。由此，可以断定，中国部分行业已经陷入到“规模经济-低成本优势”囚徒困境式的纳什均衡模式

第三，知产产权保护和执行制度自身存在的多重缺陷，是驱动中国“内卷式”竞争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中国在专利、商标等领域的知识产权执行方面存在多重制度性缺陷问题。例如，异地起诉行为通常由于被起诉企业在当地所拥有的关系网，或者是由于司法过程中各种显性或隐性地方保护主义，使得被侵权企业的裁决和赔偿述求通常难以在有效时期内得到真正落实。即便被侵权企业赢了官司，也难以在有效期内获得有效赔偿，极大地挫伤了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法的信任和使用。

即便不存在知识产权司法活动中的关系网或者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

行为往往存在认定难取证难、侵权损害认定弹性大、赔偿金额不确定以及赔偿金额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更有甚者，侵权企业往往会聘请律师拖延认定和裁决时间，造成被侵权企业往往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来应对各种法律程序，极大地挫伤了被侵权企业依靠法律途径来保障自身利益的行动动机。特别是那些创新性中小规模企业，难以支付如此巨额成本来合理主张和捍卫自身的知识产权权力。

第四，全球价值链体系所蕴含的独特治理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内卷式”竞争格局形成。按照一般逻辑，中国全面参与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性，使得中国本土企业能够利用更为庞大的国外需求市场构建规模经济优势，中国本土企业对国外需求市场的积极开拓和渗透，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企业在国内市场所面临的同质化竞争行为和低价格竞争行为，进而成为缓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外部机制。但依据实地调研和深入分析，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和贸易体系以及蕴含的利益分配机制，非但没有成为缓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外部机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助推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机制。**多数处于创新研发劣势和技术劣势的中国本土企业被动地集中产业链供应链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配套环节，被迫集中在市场进入门槛和技术壁垒较低的行业和环节领域，难以避免地成为刺激中国国内行业本土企业之间“内卷式”竞争机制形成的重要因素。**

针对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所需要的国外核心原材料关键零配件和国外产品订单，均倾向于采取垄断价格效应和纵向价格压榨效应策略，采取外包订单的企业分散竞争策略和强迫外包订单采购价格逐年压低策略，试图迫使中国的出口本土企业长期被限制或者压制在依赖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轨道之中。这是造成中国出口部门本土企业同质化竞争格局形成和低价格竞争策略盛行的重要因素。以中国纺织业为例，2024 年上半年，尽管出现下滑，但中国纺织业仍是全球市场的主导力量，占全球纺织品出口的 30% 以上。然而，2024年1-11月纺织行业利润率仅为3.56%，棉纺行业为1.92%，远低于制造业（4.54%）和工业企业（5.54%）。

那么，“内卷式”竞争能否对中国塑造全球竞争优势领先的制造业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中国特定行业的产能快速扩张与全球竞争优势的快速建立，是与中国内卷式竞争效应密切相关的，可将之描述为“中国内卷式竞争→行业和企业层面规模经济快速形成→确立全球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优势→全球市场占有率快速上升→确立中国产业的全球独一无二规模竞争优势”

的发展逻辑。

第五，部分居民群体真实收入水平增长乏力乃至最近部分居民群体真实收入水平下滑，所带来的国民消费信心不足和消费能力下降，是激化当前中国“内卷式”竞争现象加剧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发生了显著的消费层次降低现象，消费层次降低刺激了部分消费者对价格较低产品的巨大需求，激发了行业企业内的“低价格”、“低成本”主导的生产模式和市场竞争模式，加剧了中国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例如，公务员普遍降薪、国有企业大面积降薪、金融部门从业人员大幅度降薪，影响了国内至少6000万群体的中高收入群体的未来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至少2亿低收入群体和打工群体的真实收入，在2023年和2024年期间发生了显著下降的现象。

三、如何探究破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有效治理模式与重点改革举措

第一，正确理解和把握“有为政府”的合理边界。治标要治本，针对政府由正向激励效应转向负面激励效应的各类产业政策进行实施重构式调整 and 改革，弱化和消除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孕育和刺激机制体制土壤。

首先，逐步全面取消各级各地政府对以税收返还和财政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倒逼和促进各地方政府，形成遵循以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与自身产业基础、要素禀赋条件、科技创新资源相适应、相匹配的特色优势产业和产业链为导向的发展政策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原则。

其次，鼓励地方政府将各类产业政策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周期”领域调整转型，向支持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大幅度调整和转型，尤其向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的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领域的转移和倾斜。

第二，全面确立和推进“有效市场”基础性作用。真正确立和激活市场竞争机制，是解决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根本。打破部分行业内企业之间盛行和固化的“一味依赖规模经济+偏好依赖低价格竞争模式”的纳什均衡状态，通过激励企业主动依靠“长周期巨额研发投入+高成本人力资本”能力所形成的企业差异化市场竞争优势源泉，作为企业和产业的核心市场进入壁垒，来创造和强化企业和产业层面的合理市场进入壁垒，将之设定为遵循市场竞争逻辑的破解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格局的主要手段。

不可忽略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已经形成的特定利益激励相容机制，要消除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激励机制，就是要限制和消除各级各地政府利用不合理的产业政策干预手段。

第三，促进行业自发合作秩序的形成。促进重点行业内“大中小企业有序合理分工协作”为导向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体系的加速形成，以及中国特色优势新型产业组织和市场竞争关系的形成，将之设定为遵循市场竞争逻辑的破解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格局的重要手段。从政府和行业层面逐步扭转和弱化一味强调和依赖“大而全”、“大就是强”、“大就是优势”的固有发展思维，强调和突出“小而精”、“专即强”、“集群就是优势”的新型发展思维。

确立大中小企业依据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分工协作形成产业体系竞争优势的新型发展思路，引导国家和地方层面将培育和壮大以龙头企业、主导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企业、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配套企业、关键材料企业、关键工艺企业、一般配套企业之间新型分工协作关系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设定为政府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的核心目标。尤其要促进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之间依据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协作关系形成的新型关系。

第四，推进规范产业的基础制度层面重大改革举措。中国行业发展到了依靠企业破产重组和兼购合并为主的发展时期，这将深刻影响和重塑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格局。

首先，加快推进企业破产制度层面的基础性政策改革和落实。针对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难”、“破产贵”、“破产不了”的困局，特别是针对那些由于牵涉国有资产流失、银行贷款清偿、官员个人投资资产利益关系，各类债权人债务清理清偿以及个人清偿资产科学界定和查处等一系列问题，造成民营企业和非有限责任性质企业“想破产难以破产”、“拖着无法破产”等难题，尽快推进企业破产法和个人破产法领域的制度调整 and 改革。

其次，切实降低知识产权执行和落实领域的各项制度性交易成本。针对各类专利、商标、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领域频繁发生的异地诉讼难、异地查证难、异地执行难、异地赔偿难等难题和顽疾，真正强化全国巡回知识产权法院在跨区域司法执法的主导作用和核心功能；针对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微企业，难以承担依靠各类知识产权保护司法执法机制来保障自身利益的进程之中，普遍存在的时间成本太高、腐败寻租成本较高、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等顽疾，要提出针对性解决政策思路。

第五，重视外部经济约束条件的支撑作用。重视和尊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的“收入结构→需求结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市场竞争结构”的基本经济规律。科学认识当前中国“内卷式”竞争格局的形成，是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之中处于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旧产业部门，向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新产业部门转型升级的特殊时期密切相关。这一竞争格局必将随着中国经济部门中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新产业部门扩张和壮大，所蕴含的对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性推动作用，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中国“内卷式”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身经济发展进程之中的阶段性现象，需要科学认识到这个根本性的经济规律，不可操之过急，试图短期加以彻底解决。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内卷式’竞争表现形态、‘内卷式’竞争产生的内在逻辑、如何治理中国的‘内卷式’竞争”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中国产业“内卷式”竞争主要表现在价格竞争上，即企业通过降成本来实现价格下调，尤其在用工、研发削减等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依赖价格竞争的模式可能导致企业忽视研发和技术创新，进一步加剧恶性竞争，甚至可能导致偷工减料和假冒伪劣现象的出现。

当前内卷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消费降级和收入预期下降使得市场对价格更加敏感；二是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外部压力，尤其是在美国发起贸易战后，中国产品以价格作为主要竞争优势的模式受到外部制约。“内卷式”竞争不仅影响了国内市场，也对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产生了影响。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常务院长**刘志彪**认为，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内卷式”竞争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五点。第一，在某一行业生产能力远超市场需求扩张速度的情况下，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导致价格竞争激烈。第二，在企业投入方面，要素投入往往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这会加剧企业的资金压力，并导致资源浪费。第三，在缺乏创新的情况下，企业间的竞争往往变为同质化竞争，导致恶性的价格战。第四，产业进入门槛过低或政府帮助突破市场壁垒，导致大量企业涌入市场，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最终通过降价进行恶性竞争。第五，中国终端行业巨头通过压迫上游供应商降价和延迟付款，借此提高自身竞争力，这种压榨行为对上游企业造成了巨大压力，甚至导致许多供应商企业倒闭。

解决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因为这和体制改革息息相关。首先，必须加强企业的自主性和决策独立性，实施硬预算约束。其次，地方政府在竞争中的角色需要调整，既要发挥积极性，又要抑制不正当竞争。最后，在产业组织重构方面，国家政策要鼓励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形成，促进兼并收购和破产重组；在产业转型政策方面，应支持技术研发创新，鼓励企业在创新前端的竞争，支持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同时从补贴生产者转向补贴消费者，缓解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指出，“内卷式”竞争相较于传统去产能的再平衡机制是一种进步。在过去，当我们面对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等问题，通常依赖政府的“有形之手”来解决，例如通过传统产业政策来压缩过剩产能。而当前我国的“内卷式”竞争，实际上是通过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逐步出清过剩供应，即借助价格机制实现市场出清。

首先，“内卷式”竞争并非由于市场调节作用过度，而是市场调节作用不足。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应该通过市场竞争引导企业的重新进入与退出，推动重组，使市场中存活的企业实现规模化，提高市场占有率，进而达到新的市场平衡。但这一机制在中国并未得到有效体现，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出清机制存在问题，企业经营困难却难以退出市场成为普遍现象。其次，“内卷式”竞争的核心问题在于价格竞争过度，即企业发现，通过差异化竞争和提高品质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且市场未必能及时对这一信号做出正确回应，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价格竞争。从应对策略来看，解决“内卷式”竞争需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加强逆周期调节政策，扩大内需。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指出，“内卷式”竞争的核心特征包括同质化和低效低水平竞争：同质化竞争，企业重复建设、跟风扩产容易造成阶段性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下降；低水平、低效率的竞争，企业间通过相互压价以获取市场份额，导致行业整体利润水平下滑。“内卷式”竞争不仅会导致企业行为“短视化”，引发“山寨模仿”“造假售假”等问题，从长期来看还会破坏产业生态，威胁行业健康，甚至削弱“中国制造”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和增长潜力。当前“内卷式”竞争主要集中在与新能源密切相关的新兴行业、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与地产链密切相关的行业和贴近居民终端消费的行业。

针对如何破除“内卷式”竞争，政策建议如下：一是以提振消费为抓手，全方位扩大内需，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二是支持企业有序出海，构建国际利益

共同体，通过金融政策支持、简化出海流程、提高境外投资服务保障等政策，积极支持出海企业做大做强；三是平衡新型举国攻关体制与市场创新，优化供给结构，供给侧加强产业政策引导，加大行业重组力度；四是优化地方政绩考核体系，改革行业自律机制，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长效合理的发展政策。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指出，“内卷式”竞争是市场中不正常的现象。正常竞争应当推动市场发展、提升产业效率、改善消费者福利，而“内卷式”竞争则表现为企业相互压价、低效恶性竞争。例如，我国光伏产业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但却在巨额政府补贴的支持下，以亏损的价格在国内和海外销售，表明竞争已失去应有的合理性。

其根本原因是总需求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和企业行为与体制问题。首先，我国面临结构性的总需求不足，即投资过剩和消费不足。我国居民消费在 GDP 中的比重仅为38%，远低于拥有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从而导致“内卷式”竞争，国内外市场都被迫陷入价格竞争。其次，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依赖低价竞争而非技术进步。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这种恶性竞争加剧了产能过剩，形成了低效的市场环境。最后，企业行为与体制问题，即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导致了不正当竞争和产能过剩，具体表现为企业依赖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来参与“内卷式”竞争，加剧了市场扭曲。

市场出清与“内卷式”竞争？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以下观点整理自杨瑞龙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97期）上的发言

中国产业“内卷式”竞争主要表现为同质化、低水平、相互压价的低效竞争，主要原因可概括为：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需求不足导致供需失衡；供给相对过剩；供给过剩主要体现为产能过剩；外部环境变化限制产能向外转移；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扭曲企业进入成本等。

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以及人口红利等逐步减少，直接导致成本端压力上升。与此同时，供给过剩又使得整体市场价格呈下降趋势，从而出现了成本上升、价格下降的双向挤压现象，直接导致企业利润持续收缩。内卷式竞争使企业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如何看待内卷式竞争以及如何应对内卷式竞争？我发表以下五个观点：

一、中国产业“内卷式”竞争相对于过去传统的市场出清机制是一种进步

目前舆论界对内卷式竞争是一面倒的负面评价和批评，但我认为“内卷式”竞争相较于传统去产能的再平衡机制是一种进步。市场供求非均衡是市场运行的常态。在过去，当我们面对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等问题时，通常依赖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实现再平衡，例如通过传统产业政策或行政命令来压缩过剩产能，或通过限制投资减少供给。然而，这些措施往往会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局面。因为产业结构的背后是利益结构，如果不对利益结构进行调整，仅依靠政府的“有形之手”强制干预，压下去的产能还好改头换面重新滋生进而产生新的非均衡，从而会导致资源错配和成本扭曲。而当前我国的“内卷式”竞争，实际上是通过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逐步出清过剩供应，即借助价格机制实现市场出清。以价格调整为主要手段的内卷式竞争虽然有些“残酷”，但它毕竟属于企业自主选择的一种市场调节方式，相对于过去的行政干预方式是一种进步。

二、中国产业“内卷式”竞争并非市场调节过度，而是市场调节不足

有人认为内卷式竞争是不合理的无效或低效竞争，过度的市场调节导致资源浪费，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应该由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我认为内卷式竞争导致资源浪费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出清机制受到了行政力量的干预，从而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将价格调整作为主要手段的市场出清机制，在有效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价格竞争会引发优胜劣汰，竞争失败的企业退出市场，竞争胜利的企业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通过市场竞争引导企业的重新进入与退出，推动重组，使市场中存活的企业实现规模化，提高市场占有率，进而达到新的市场平衡。但这一机制在中国并未得到有效体现，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出清机制存在问题，在行政力量干预下，扭曲了企业进入或退出成本，导致企业“活不好、死不了”，妨碍了产业的重组。

企业“活不好、死不了”的主要原因是进入门槛较低和中国特有的地方政府竞争所导致的。各地政府在激烈竞争中，往往会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如零地价、财政补贴等，从而扭曲了企业的进入成本。同时，企业的退出机制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在市场竞争中，经营不善的企业应该退出，但这些企业可能是地方的纳税大户或地方 GDP 的重要贡献者，因此政府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保护，试图让这些企业继续存活。同时，破产制度不健全也是一个原因，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制度及预算软约束使其难以破产，民营企业破产难破产贵，不健全的破产机制和受限制的退出机制导致通过价格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及规模化经营的机制受阻，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也因此受到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竞争未能带来预期的市场调整效果，即市场发挥作用并推动后续进程的过程中，受到了体制性障碍或政府干预的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确保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三、价格调整过度、非价格竞争不足是导致内卷式竞争低效率的另一重要原因

通常来说，当企业面临市场非均衡的情况时，可以选择多种调整方式来应对。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价格调整，即通过压低价格，在相同品质下以更低的价格赢得更多市场份额，这通常表现为价格竞争；另一种方式是非价格竞争，即在相同价格下，通过提高产品品质来吸引客户并获得更多市场份额，这通常被称为非价格竞争或差异化竞争。此外，企业还可以在市场非均衡的信号引导下，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数量上的调整。企业面对市场非均衡时既可以采取价格调整，也可以采取非价格调整。

然而，在当前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采用价格调整，因为非价格调整机制在中国市场环境下受到一定限制。其原因：一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即提高产品品质所传递的信号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有效显现，并且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目前的市场普遍存在短期行为，且不守信用的企业和商人往往不会受到有效惩罚，从而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企业发现，通过差异化竞争和提高品质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且市场未必能及时对这一信号做出正确的回应，这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价格竞争。

二是品牌的差异化竞争方式是另一种非价格竞争方式。生产相同的商品时，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商品通常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但打造品牌需要时间和积累。另一方面，如果市场中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且制假售假的行为得不到有效打击，企业不会愿意通过品牌建设来进行差异化竞争，而是会选择短期有效的价格竞争。

三是差异化竞争方式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获得专利技术来获得竞争优势。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如低成本的技术模仿甚至技术剽窃现象严重，那么企业就会缺乏技术创新积极性。因此，目前市场上主要是短期竞争，尤其是以价格为手段的短期竞争。为了引导企业更多地进行非价格竞争，改善市场环境是关键途径。

四、应对“内卷式”竞争的重要途径是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能够有效化解“内卷式”竞争带来的低效率问题，打破依靠低价、低质量和低成本赢得市场的旧有模式。要实现转型升级，一方面需要建立健全的产权激励机制，激励企业创新，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引领新型生产力发展，打造核心关键技术，利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提升企业竞争力，进而形成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因此，我们需要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同时，要出台产业支持政策，提升整体创新水平。

五、解决“内卷式”竞争还需要加强逆周期调节政策，扩大内需

应对过度供给的市场非均衡现象，从微观层面企业可以通过价格竞争或非价格竞争来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实现优胜劣汰。从宏观层面国家可以通过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供求关系。目前我国总需求不足，如果能够提升需求水平并改善供求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度供给，进而缓解或解决“内卷式”竞争问题。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了实施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有助于弱化“内卷式”竞争，为企业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宏观环境。

中国式“内卷”：辩证看待，且战且调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97期）上的发言

中国企业“内卷式”竞争主要就是卷价格。当前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周期性调整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仍存，疤痕效应叠加资产缩水影响下，居民收入预期偏弱，消费降级现象显著，消费者对价格更为敏感，完全市场化的中低端服务业价格下降尤为明显。从国际视角来看，逆全球化趋势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地缘政治形势更加复杂，中国过去在国际贸易中形成的以价格为核心的竞争优势受到了国际的密切关注，甚至引发了一些“反倾销”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加需要关注中国企业“内卷式”竞争现象，客观认识企业“内卷式”竞争的内涵，厘清其形成机制，方能妥善应对。

一、何谓企业“内卷式”竞争？

首先，中国企业“内卷式”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卷价格，而降价格主要依赖降成本，降成本则源于降薪、裁员、降研发。尤其对于产业门槛和技术门槛相对较低、产品易于复制的行业，后发企业有更大的降成本空间。先发企业从 VC 开始，经过多轮投资最后形成了产业格局，在此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但后发企业并不需要这么大规模的基础投入，可以直接使用现成的技术、设备等，因此其成本较低，更容易实现内卷。

目前，中国企业“内卷式”竞争已经对国内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国内，“内卷式”竞争导致商品价格下降，带动企业利润下行，进而造成居民工资收入和消费能力下降。另外伴随“内卷式”竞争进一步加剧，市场或逐渐以价格作为衡量产品的唯一标准，就可能导致在过去技术落后、残酷竞争的时代曾经有过的“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现象再度出现。在国外，中国企业“内卷”引发了一些负面舆论，例如德国总理舒尔茨曾表示，“我们欢迎中国汽车，但不欢迎中国汽车在我们这边倾销”，意为中国的低价产品冲击了德国的就业市场，类似的说法甚至更为极端的表态都反映出全球对中国低价商品的“不欢迎”。

二、辩证看待中国企业“内卷式”竞争

全球贸易在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中发展，对价格优势的认识要有所调整。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认为，比较成本最终体现为价格优势，在全球自由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比较成本学说，在全球自由贸易背景下，先发国家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获取资金进行生产，然后凭借其产品价格优势占领市场，再逐步建立自身从生产到技术再到研发的优势，最终成为后发先进国家。国内很多研究中国成功秘诀的学者都是在比较成本学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的。但实际上，全球贸易大多数情况下并非自由贸易，不同利益集团间容易形成贸易保护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为应对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用以保护本国市场。在逆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对价格优势的认识要回归到国际贸易的本质，即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由于价格优势与商品倾销的界限较为模糊，因此在国际贸易趋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我们的价格优势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商品倾销。过去，全世界对低价商品在本国倾销均采取了较为激烈的反制措施，现在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低价商品也较为关注。因此在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中，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内卷式”竞争带来的产品价格优势，对价格优势的认识要有所调整。

首先要认识到，“内卷式”竞争带来的低价格确实为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了竞争优势，促进了出口，在外需不确定性增加，且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建立的背景下，我们应对现有竞争优势加以保护而非一味批判。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已经形成，应当设法保护该竞争优势，不能以他人意志为转移，盲目提升成本和价格。如果没有价格优势，中国就无法保持现在的国际贸易地位，中国的外贸和经济增长将面临很大压力。近年来中美贸易战持续加码，中国的出口还能延续增长，离不开价格优势。价格优势的存在使得中国在未来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危机，保持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例如显示屏行业，原来中国需要从国外进口，随着中国长期持续投入，技术的提高导致成本下降，中国已经将台湾淘汰，成为该领域的新领先者。对于“新三样”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应当正视价格优势的积极作用，对先天优势不能轻易放弃。如果内卷是中国企业现在能够用的法宝，甚至是唯一法宝，为什么不用呢？市场是一个整体，市场竞争的核心还是价格，要相信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正视价格优势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企业“内卷式”竞争的优势正在向劣势和问题转化，需警惕潜藏的风险。过去的成功经验不一定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竞争就是要不断面对新竞争格局、新情况和新问题。目前来看，可能企业“内卷式”竞争本身已经成为了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认真分析和解决。内卷是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有效竞争手段。过去人口红利的表现形式是低端劳动力，新时期人口红利的表现形式转变为低成本工程师，这是中国人力资

本的竞争优势。但是现在，企业“内卷式”竞争已经对工资上涨和充分就业构成了较大压力。过去随着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产品的扩张，居民工资是上升的，就业机会是增加的。但当前，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了，但就业机会却减少了，居民收入并没有伴随产品扩张而上涨，相反却出现萎缩，进而导致消费能力下降。这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表明企业“内卷式”竞争可能正在由优势转化为劣势，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同时，卷价格导致企业长期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制约企业投资，打击企业信心，不利于经济修复。当前以低价作为竞争手段的现象较为普遍，招投标中投标企业为了中标会降低报价，地方政府为拉动经济，也纷纷采取降门票甚至免门票的方式，市场上各类产品也普遍打折降价，另外在供应链中，有优势的链主企业在采购中也会压低价格，导致企业长期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甚至出现了有的企业销售额较多，但利润稀薄，甚至亏损的“乱象”。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会造成企业界投资不振，拖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打击企业信心，制约企业行为，进而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造成危害。

三、“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机制及应对思考

当前从价格视角来看，我认为企业“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来源于供需问题，长期供过于求导致产能过剩，推动了企业内卷。从需求端来看，近年来需求萎缩，特别是内需不足，终端消费走弱问题突出。从供给端来看，中国长期供给端发力形成了大量的产能，导致供给过剩。在需求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的政策又多从供给端发力，在供给端配置了较多资源，即便是从需求端发力的政策，也多侧重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又很快转化为供给，加剧产能过剩。例如，2008年危机后中国采取了持续宽松的政策刺激经济，供需失衡问题初现端倪，但国内学者甚至政府都强调问题不是需求疲弱，而是出在供给侧产品质量不高，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全面在供给侧发力。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在供需两端发力不均衡，是导致出现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趋同的产业政策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是企业“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各地政府为招商引资，推出了各种产业基金，趋同的产业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同质化竞争。各地政府同时推动某一行业发展，很快就能把一个行业从“风口”变成“风险敞口”。比如中国光伏行业的产能是全球需求量的2倍以上，虽然以后需求还会增长，但如此大的产能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投资损失和资源浪费。我们应该反思政府下场亲自搞投资、亲自搞产业布局的

利弊，是否正在从利大于弊转向为弊大于利，是否会加剧产能过剩，进一步推动企业“内卷式”竞争。

如何解决中国企业“内卷式”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影响着国际贸易运行，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走势。中国企业“内卷式”竞争的问题很复杂，最终还是要要在经济发展中解决问题。在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政策支持企业出口的背景下，中国亦不能例外，在新的国际贸易优势形成之前，我们要保持已有优势，不能简单粗暴的大幅提升产品价格消除“内卷”，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同时，政府应出台政策，保护中国出口产业在当前有价格优势的情况下的竞争格局。但在维持现有优势的前提下，面对新问题要积极进行治理。治理过程中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从认识到政策到行为的一致性预期，积极应对“内卷式”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走出通缩的重要内容。一是要重视企业低价竞争的乱象，并出台促进公平竞争的相关政策，限制企业以低于成本的方式不正当竞争。二是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防止政府不当干预加剧产能过剩。三是链主企业要积极采取措施，针对产品定价、工资福利、劳动考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全面梳理，认真思考，主动采取改进措施，回应社会关切，切实为改变“内卷式”竞争做出贡献。最后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速形成新竞争优势。当然，这个过程离不开学界的支持。中国企业“内卷式”竞争不仅给中国，也给全球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理论上怎样重塑世界贸易理论。伴随中国逐步迈入发达国家门槛，世界贸易和竞争的基本理论可能会发生改变，简单依赖成本学说构建理论框架的做法在当前的形势下需要调整，未来建议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中国“内卷式”竞争的生成逻辑、原因与对策

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常务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志彪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97期）上的发言

当前，内卷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它已经从实质上影响了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态势和方向。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内卷，正如波特教授曾指出的，日本企业是“决战于国内，决胜于国外”，通过国内市场竞争获得了国际竞争力。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内卷式”竞争是导致目前经济紧缩的一个原因。若后者成立，则该问题将变得相当严峻，而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市场竞争现象。

一、从产业经济学看，内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内卷问题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在微观层面，它涉及企业战略与行为的选择，如低价占领市场；从中观层面看，则需要关注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互动关系，如进入退出与竞争程度的关系；而在宏观层面，则需从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的角度，对宏观态势与趋势进行把握。我将专注于从中观产业的角度进行探讨。

一是从行业平衡杆，当一个行业的生产能力或供给能力显著超过其市场容量的扩张速度时，会导致每个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不断缩小。由于市场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生产能力扩张，很容易引发价格战。这种情况在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这几年。张杰在讨论此问题时举出的多个例子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库存压力的增大和供给过剩，直接导致了价格战的爆发，这成为汽车行业反思利润率低甚至亏损的重要因素。

二是从投入要素的收益来理解。内卷主要表现为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直至边际收益降至零或变为负值。这时企业仍继续投入的原因，是因为恶性竞争引发生存威胁，谁不继续投入谁先死。在过去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之间为了吸引大项目，竞相提供优惠条件，如“三免两减半”“五免五减半”等政策，最终导致地方收益微薄，而大部分收益流向了投资者。针对重大项目采取的“一事一议”竞争策略，不仅牺牲了要素投入的合理报酬，损害了国家利益，还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调研发现，许多县市的开发区负债占全市或全县总负债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而实际项目投入的边际收益常常为负或接近零。自由

裁量权过大的招商引资行为，不仅使利益过多流向资本所有者，还滋生了大量为获取项目利益而一拥而上的群体，进而导致产能过剩。

三是从创新的角度分析。在缺乏创新的环境中，技术发展主要依赖于模仿和引进，企业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同质性竞争，最终演变为恶价格战。由于同质性竞争的产品缺乏差异化和定价能力，企业无法通过产品特性来控制市场份额，因此也就无法提高价格，只能通过降低价格来竞争。例如，在手机射频芯片市场，主要由几家大型跨国公司垄断，这些公司还对技术进行了封锁。因此，国内同行企业在这一个市场的竞争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同质化竞争，竞争手段主要以降价为主。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软件领域，中国的工业软件大多处于功能简单、系统单一、行业复杂度较低的市场中，市场规模有限，竞争主要依靠价格优势。

四是从产业进入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产业的进入门槛过低，或者虽然存在一定的进入门槛，但竞争者可以在政府力量的支持下轻易突破这些门槛时，会导致有限的市场容量中迅速涌入过多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最终往往只能通过降低价格来进行竞争，从而引发恶价格战。在中国的风能和光伏行业中，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光伏行业这两年产品价格下降了70%-8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帮助企业突破行业竞争壁垒。光伏行业的技术壁垒相对较低，从硅片、电池片、组件、光伏玻璃到胶膜等各个环节的技术壁垒都不高，在地方政府保护政策的影响下，这些壁垒很容易被突破。因此，中国光伏行业表现为高度的内卷现象。

五是从产业链的角度分析，中国在终端产品领域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形成了众多行业巨头。然而，这些巨头往往把它们之间的激烈竞争压力，通过各种方法与渠道转嫁给上游供应商，表现为掠夺供应商式的增长。例如下游的链主企业对上游供应商延迟支付货款，经常长达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或者强制要求供应商短期迅速降价15%-20%，否则就拒绝采购其产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通过压榨上游企业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如近期流传的案例包括比亚迪要求其供应商降价10%，这已经算是较为温和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下游巨头长期拖欠上游供应商货款，利用供应商的流动资金来支持自身的低成本扩张，这种做法对许多中国供应商企业造成了致命打击。此外，各种针对最终产品的集中采购行为，如通信设备市场的集采和药品市场的集采等，也常常导致价格被压低到令人惊讶的水平，这种情况非常严重。

二、内卷发生的原因分析

内卷现象可以从经典的技术——市场——制度三个维度结构进行分析。下面我们简单总结如下。

一是从中国企业的战略理念看。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依赖的竞争理念，是非合作竞争博弈，而非是双赢的合作博弈理念。这种理念基于零和竞争的思维，即通过降价等手段将竞争对手逼入困境，从而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寡头。这种竞争思想不仅在国内市场存在，在国际市场上也同样盛行，但其往往不受所在国企业和政府的欢迎。如张杰所述，即使没有产能过剩，这种竞争观念也会导致内卷现象的出现。在通常情况下，内卷是产能过剩的结果，但在中国，即便某些行业的产能并未过剩，内卷现象依然存在，原因在于企业秉持的零和博弈观念：一方的损失即为另一方的收益。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方式长期被教科书所传播，认为竞争就是丛林法则下的你输我赢。然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这种竞争方式往往会遭到强烈的反感，引起对企业形象的负面看法。

二是从产业组织结构看。中国的产业组织机制长期存在不健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尽管经过数十年的竞争，中国的企业在行业市场中仍未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中常见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其中若干寡头企业主导市场，同时带动大量中小企业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发展。这种结构促进了产业链主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以及治理机制的形成，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

分析产业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寡头垄断竞争结构的形成，是基于长期竞争和兼并收购机制的共同作用。一方面，长期的竞争促使企业不断优化和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兼并收购和企业的倒闭破产机制则通过市场整合，逐步形成寡头企业。这些寡头企业之间并非完全垄断，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同时，寡头企业与大量中小企业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寡头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默契。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旨在防止垄断关系的形成，但在其框架内，企业间的合作仍有助于市场的有序和稳定发展。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竞争范围不断扩大，但在产业组织层面尚未形成典型的寡头垄断竞争关系。这与中国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缺乏大规模的兼并收购和企业破产倒闭浪潮有关。如果未来能够经历几次大规模的兼并收购浪潮，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西方国家在大约两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中，经历了八次大规模的兼并收购浪潮，这些浪潮塑造了当前的市场结构。相比之下，中国尚未经历过类似的兼并收购浪潮。因此，中国产业

组织结构的不健全以及随之而来的内卷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产业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观点的。

三是从政府参与竞争的方式看。中国政府参与竞争的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或加剧了**产业组织结构的缺陷问题**。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特点之一，是中央向地方政府分权，而非将所有权力下放给企业。地方政府成为发展的主体后，拥有了多种参与市场竞争的手段。其中，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是地方政府常用的竞争方式。近年来，一个尤为严重的新现象是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各种基金来参与竞争。例如，当企业项目寻求投资时，地方政府可能会提出提供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基金跟投来体现支持，以此来吸引企业在当地投资。这种大规模的资金支持使企业具备了采取掠夺性竞争策略的实力，这一现象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目前，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投资基金跟投的方式，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过去，地方政府常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如“几免几减半”、土地先不收费后续补贴或先收费后返还等方式来吸引企业投资。然而，这些做法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下，已不再被国家政策所允许。目前地方政府转而采用基金投资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这种方式具有潜在的风险，因为它可能会加剧市场的内卷竞争。

四是从体制机制看。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行政区域格局，正在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行政区域格局让竞争主要在块状经济之间展开。在这些块状经济内部，协调机制往往是行政命令与市场协调的混合体，而外部协调机制则主要依赖于地区间的行政关系。这种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公平竞争。最近发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标准指引》旨在解决这一问题，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然而，由于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尚未完全理顺，该指南虽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无法彻底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基本职能，然后再确立中央与地方之间责任分工、财权关系。

三、解决内卷问题的方法

1、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加强企业的自主性、决策独立性建设，实施硬预算约束。没有硬预算约束，企业就不会谨慎使用资源，也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的企业无法在市场中进行有效的竞争。

2、要进行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的体制改革。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竞争的体制很难改革。在这一体制中，既要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要防止不正当竞争现象的发生，这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系，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可能还是要从权力制约、职能分离等方面，依据法治化来慢慢解决。

3、要重构中国产业组织结构。国家政策应致力于促进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形成，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推动企业的兼并、收购、破产和重组活动。

4、国家宏观层面政策的努力。因时间关系，我重点讲一下对产业政策转型的几点建议：

（1）要支持产业政策向前端转移，而非后端的产能复制。过去产业政策往往支持产能的复制扩张。这在短缺经济时代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仅加剧了市场竞争和产能过剩，也促进了内卷现象的发生。产业政策现在应当更加注重前端的研发与创新。张杰等人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产业政策应支持研发创新的前端。尽管前端竞争的加剧可能会导致一定的资源的重复投入，这看似是浪费，但实际上这是技术进步所必需的成本与代价。一旦有企业通过研发取得成果并申请专利后，其他企业就会自然退出。因此，产业政策应从支持产能扩张，转向支持科技创新，特别是前端的创新活动。

（2）产业政策的补贴方式需要进行方向性的调整。以往的政策多倾向于补贴生产者，这种做法容易导致产能过剩、企业寻租与腐败。当前政策应转向补贴消费者、用户和客户，以此来扩大市场需求。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缓解内卷问题。

（3）产业政策的实施方法需要转型。过去的做法主要是挑选输家与赢家，事先不通过竞争就选择性地支持那些被认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忽视了其他企业的发展需求。这种做法除了不公平之外，也会助长产能过剩。当前产业政策应当支持创造有利的、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而不是单纯地支持特定企业。

（4）产业政策实施的主体要上移。应与地方政府职能改革相结合，将地方主导型产业政策转变为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这是构建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前提。如果产业政策职能继续由地方政府主导，那么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将难以形成。因为市场会被地方政府的产业竞争手段分割成块状结构。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回归计划经济，而是要减少产业政策的数量，让中央政府集中资源支持几个关键产业，而不是对所有产业都进行政策干预。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产业政策通常都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地方政府很少涉足。中国的特殊情

况在于，产业政策大多由地方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并非出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是参与市场竞争，这导致了市场的分割。因此应将一些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产业，尤其是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产业政策，放在中央层面统一执行，有利于实现规则的一致性、政策的统一性和行动的协调性。此外，对产业政策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方向四产业政策竞争化使用，可以从选择性支持特定企业的做法，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一方面是把产业政策当成强化竞争能力和技术突破来推动，另一方面是运用竞争政策实现产业发展的战略目的。这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的课题。

中国“内卷式”竞争的三个不正常现象及其解决路径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滕泰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97期）上的发言

正常的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内卷式”竞争超出了正常的竞争范畴。以光伏产业为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已处于领先地位，几乎消除了竞争对手，理论上应享有高额垄断利润。实际情况却是，即便在获得大量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企业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销售产品，导致每年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亏损。这种现象严重违背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

一、第一个不正常：宏观环境不正常及解决路径

“内卷式”竞争的出现有多重原因，其中经济背景的不正常是关键因素之一。当前，中国宏观总需求不足，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将扩大内需作为后续工作的重点。然而，宏观总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结构性问题，表现为投资过剩与消费不足并存。从数据来看，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仅为38%，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最低水平，比其他国家平均低20到30个百分点。即便将政府和集团消费计算在内，总消费占比也仅为54%，同样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生产的工业品占全球总量的35%，而国内消费仅占全球工业品消费的14%。这种供需不平衡导致了国内外市场上的“内卷式”竞争。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当前应着重扩大内需。经济工作会议将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扩大内需列为首要任务，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从目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看，力度仍显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应尽快从以建设为主转向以民生为主。目前，我国扩大内需的手段仍停留在罗斯福新政的阶段，而美国在经历大萧条后，通过罗斯福新政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来扩大内需，但在六七十年代经济下行时，约翰逊总统转而推行“伟大的社会”计划，注重民生工程的建设。到了2000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时期，美国则采取了直接发放资金和量化宽松等政策。因此，财政政策的关键不在于财政赤字的规模，而在于资金的发力方向。如果方向正确，例如通过发放消费券来促进消费，即使赤字率不高，也能有效提振经济。相反，如果资金用于低效或无效投资，即使赤字率再高也无济于事。财政政策应加快转型步伐，以更有效地扩大内需。同样一笔财政资金，如果用

于发放消费券，可以带来三到五倍的宏观乘数效应，而用于投资，无论是低效还是无效投资，总体乘数效应仅为1.06，效益相差甚远。

其次，当前的货币政策力度尚显不足，特别是在汇率政策的定位上存在问题。对于大国开放经济而言，与小国开放经济模型不同，汇率政策应当置于次要位置。在必要时，可以牺牲汇率以保经济增长，而不应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来维护汇率稳定。经济增长、就业、物价、企业盈利状况以及资本市场和房地产价格等都直接影响着14亿人的福祉和每一个企业的运营，而汇率主要影响的是对外经济活动。此外，将商业银行的盈利置于优先位置也是不妥的。在几百年的近代经济史中，没有一个经济体在经济下行期将银行盈利放在首位以保护银行息差。在经济不景气时，银行出现亏损是正常的经济现象，待经济复苏后，银行自然会恢复盈利。在各行各业普遍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不应过分强调保护银行的息差，从而限制了降息政策的实施。

总体而言，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为方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无论是财政政策从以建设为主向以民生为主转型，还是货币政策在降准降息方面的宽松力度，都受到全球化条件的诸多限制，因此需要加快政策调整的步伐。如果内需增速不足甚至出现萎缩，那么“内卷式”竞争的背景就无法消除。因此，扩大消费和转变观念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二、第二个不正常：企业缺乏创新能力，亟待告别后发竞争模式

中国企业以及中国经济尚未完全摆脱后发式增长的传统路径，长期以来作为跟随者，通过学习西方成熟市场的市场化经验，以价格战和成本竞争为主要竞争手段。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以及进入后工业化和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继续沿用后发经济的价格战和成本竞争模式已不再可行。中国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家群体，虽然熟悉传统的降成本管理模式，并且在生产函数的框架下运用得心应手，但对于以创新为核心的新的管理模式却相对陌生，存在不敢创新和不会创新的问题。生产函数与创新函数的主要区别在于，生产函数通常体现为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线性或正比关系，而创新函数则描述了一种不确定的概率关系。在创新函数中，投入与产出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对应，而是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投入较少而产出巨大，也可能投入巨大而产出为零。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许多传统企业家在面对创新时显得犹豫不决，更倾向于通过降低成本来维持竞争力，而不是冒险进行创新投入。如何掌握创新的方法，成为中国企业家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例如，在硅谷，众多企业如英伟达等能够

不断产出创新成果。华为公司从90年代的通信设备制造商转型为如今的科技巨头，其研发成本能够带来丰富的产出。然而，许多中国企业家对于类似 IPD、OKR 等以创新为基础的管理方法和考核机制还较为陌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教育不仅要教授生产函数和传统的风险管理方法，还应涵盖创新函数以及基于创新的研发模式、场景创新、产品创新和生产模式创新等管理方法。目前，在院校和 EMBA 培训中，对于这方面的教育还相对不足，导致企业转型缓慢，从而加剧了“内卷式”竞争的局面。因此，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中国企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第三个不正常：地方政府参与内卷不正常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仍采用传统手段，如提供免费土地、代建厂房、廉价电力以及风电新能源指标等优惠措施，并实行“三减一免”政策以吸引企业投资。这些投资在宏观层面上多为过剩产业，虽然降低了成本，但若其产品能够生产出来，可能会对其他企业造成冲击。**地方政府通过免费土地、代建厂房、低廉的能源成本、税收优惠甚至直接的财政补贴参与“内卷式”竞争，但这种竞争的成果并未真正惠及企业。**例如，许多出口产品在获得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后，以极低的价格销售给海外消费者，有时产品的利润甚至低于补贴的利润，企业仅能依靠出口退税等政策获利。面临着投资过剩的问题，每年有数万亿的低效和无效投资由政府主导；同时，生产也过剩，每年有数万亿的生产补贴。尽管我们的出口已位居全球首位，但每年仍有数千亿至数万亿的出口补贴。与此同时，国内消费不足，尽管已呼吁发放消费券多年，但几千亿的消费券发放规模相较于其他补贴来说仍然较少。提到为民众发放消费券，就以资金不足为由，而对于投资、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却似乎资金充裕，这反映出观念上的问题。因此，在讨论“内卷式”竞争时，政府不应继续积极参与供给侧的干预，而应逐步退出，避免参与这种竞争。要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决策观念、行为模式以及奖惩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才能有效改变当前的局面。

除了前述的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文化因素和沉淀成本等。文化上的“内卷”现象并非企业领域所独有，在中国，孩子们从小学阶段就开始面临激烈的竞争。因此，如何从文化层面进行改变，是需要从学术角度深入探讨的问题。此外，如何尊重人力成本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中国的电子消费品企业愿意为苹果公司做代工，因为加入苹果的供应链后，其毛利率能得到保障。相反，为国内企业做代工往往利润微薄。在国外市场上，企业可以通过亏本的方式击败竞争对手，而在国内市场，却要求产业链上的企业无

法盈利，这种文化上的现象令人困惑。因此，“内卷式”竞争不仅是一种不正常的经济现象，也是一种不正常的文化现象。其核心在于尊重人力成本，除了取消不合理的补贴、免费土地、免费厂房、低廉能源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措施外，还需要尊重劳动时间，包括企业管理者自身也应尊重自己的时间。只有确保合理的利润，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销售。

最后，这一现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虽然它目前显得不正常，但随着扩大内需战略的逐步实施，经济总量的增长将有助于缓解“内卷”现象。后发式增长模式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随着企业逐渐掌握以创新函数为基础的新型管理方法，中国企业有望摆脱过度竞争的“内卷”状态。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已不如从前，土地财政的依赖逐渐减弱，因此，不合理的补贴也将逐渐减少。在文化层面，对于过度“内卷”的反思也在不断深入。以白色家电行业为例，该行业曾经经历过激烈的竞争，但现在国内企业如美的、格力、海尔等已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在全球市场拥有销售网络和定价权，获得了不错的利润，并展现出产品的创新能力。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度过这一特定阶段后，光伏产业、新能源汽车以及其他消费品行业也将逐步告别“内卷式”竞争，转向以创新为基础的新增长模式。通过中国经济的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引领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破解“内卷式”竞争——特征、成因与应对

罗志恒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罗志恒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97期）上的发言

“内卷式”竞争引发各方高度关注，我们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宏观经济和财税视角发现：“内卷式”竞争影响到了宏观经济运行，同时其产生部分地源自财税制度重供给轻需求。

从宏观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背离的现象。2024年前三季度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4.8%，但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导致GDP平减指数连续六个季度为负，PPI也连续26个月为负，这使得名义增长率仅为4.0%。当经济的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时，就会出现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企业营收增速相对偏低的情况，进而导致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背离。名义与实际增速背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价的下降以及背后的“内卷式”竞争。当然，除了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外，中国经济增速还存在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背离现象。

从财税制度来看，当前的财税制度在支持供给和生产端能够发挥出较大作用，但对需求的支持相对有限。比如生产地原则的税制，注册地和生产在哪里，税收交在哪里，这使得地方政府的精力和竞争主要体现在招商引资，而非改善消费环境等。这种倾向可能加剧供需失衡，并进而引发“内卷式”竞争现象。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苛求制度，因为既有的财税制度产生于供给短缺的时代，供给短缺时代下解决供给问题是核心任务。当前中国经济从供给短缺进入到需求不足阶段，要推动相关制度改革。

具体而言，主要汇报三个问题：其一是“内卷式”竞争的特征及代表性行业；其二是“内卷式”竞争的产生原因；其三是治理路径。

一、“内卷式”竞争的特征及代表行业

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是天然存在的，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改善消费者福利具有重要作用。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卷式”竞争有两个最核心的特点：同质化竞争、低效低水平竞争。第一个特点，同质化竞争主要通过价格战进行，而“非价格竞争”如

品牌建设和技术创新则进展缓慢，不是主要的竞争方式。这种同质化竞争导致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事实上，一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经大幅下降。**第二个特点**，低效低水平竞争则不是一种良性竞争，体现为利润率持续下降，这种竞争无法改善消费者福利，也不能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更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例如，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价格竞争，导致了整个行业的营业利润率降至3-4%的水平，而燃油车的利润率更低。这两个核心特征清晰地反映了“内卷式”竞争的问题所在。

根据“内卷式”竞争的两个核心特征，我们可以分析当前哪些行业正面临此类竞争。首先，同质化竞争表现为企业的盲目跟风建设和重复投资，这可以通过观察产能利用率来识别。其次，低效低水平竞争通常以低价为主要竞争手段，这会导致行业利润率下降。因此，通过分析产能利用率和行业利润率这两个指标，可以对行业的竞争状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在具体分析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时，我们采用2024年前三季度的数据，并将其与历史均值进行比较。由于不同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具有特定的行业特征，因此通过与历史均值的比较来剔除这些行业特性的影响。从数据中可以发现，水泥、玻璃等非金属矿物质行业、新能源汽车相关行业、专用设备和计算机行业、食品医药行业等四个大类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历史均值。

产能利用率是统计局发布的指标，行业分类相对较少，于是可以采用上市公司数据加以佐证，可以得到更加细分行业的情况，所得结论与之一致。类似产能利用率的指标，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在历史平均分位数水平之下，分析结论与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相符，在此不再赘述。

产能利用率仅是研究的一个维度，还需考量利润情况。从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体和分行业的情况来看，其利润率呈现急剧下滑态势，行业分布与产能利用率大致相当。综合这两个指标能够发现，当前“内卷式”竞争主要集中于四大方向：

其一，与新能源紧密相关的新兴行业存在供需错配问题，需求在扩张，但供给扩张速度更快。近年来，该领域供给端大幅扩张，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其销量与渗透率快速增长，而产能扩张速度远超需求扩张，这背后既有经济周期因素，也有政策导向影响。2020年下半年疫情得到控制后，中国的供给率先恢复，同期美国等经济体因疫情供给能力下降、采取保需求政策，供需链条由此形成，中国出口形势良好，带动大量投资涌入新能源领域。在此过程

中，地方政府的干预力度对产能扩张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增速下行，产能利用率就逐步下降。

其二，与房地产链条相关的行业，房地产持续调整转型带动水泥玻璃集中的非金属矿物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通过打价格战的方式勉强维持生计。

其三，与终端消费能力不足相关的中下游行业，食品药品等行业，背后是内需不足。

其四，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行业，包括专用设备及电子计算机行业，主要是外需影响导致。

二、“内卷式”竞争的原因

可以从三个维度分析其成因：其一是制度和政策层面，其二是经济周期，其三是产业发展规律。

（一）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来看，生产地原则税制、建设型财政支出结构、歧视性土地定价、政绩考核与政绩宣示等容易导致供需失衡，表现为供给大于需求。

其一，我国采用的是生产地税收原则，即税收归属与企业的注册地和生产地相关联。与之相对的是消费地税收原则，如果按照消费地原则征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改善消费环境的竞争。地方政府的干预方式多样，其中通过招商引资补贴供给端的方式与税制结构有较大关联。生产地税收原则导致地方政府过于重视供给和生产，而对需求的关注不足，从而引发供需失衡，出现供给大于需求的现象。未来，若能从生产地原则逐步向消费地原则转变，或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消费地原则，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将发生显著变化。

其二，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正处于从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的过程中，建设支出占比偏高、民生支出占比偏低导致供给强、需求弱。近年来我国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不断提高，2023年财政支出占比已达到40.7%，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但与居民的期望仍存在一定差距。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出中仍有大量用于补短板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就导致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仍不足以打消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进而影响需求的充分释放。

其三，对工业用地价格低廉、居民住宅用地高昂的歧视性土地定价也影响了供需失衡。工业用地通常以低价甚至无偿划拨的方式供应，因为工业用地低价策略能够吸引资本，能增加当地产值和财税收入。相对地，居民住宅用地的价格则较高，进而推升了住宅用地价格，影响消费需求的释放。于是，工业用地对应着供给，居民住宅用地对应着需求，这种差异化的定价策略导致了供给增加、相对抑制了需求。

其四，在探讨新能源产业时，还应关注其背后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政绩宣示。新能源产业对地方财政税收的贡献相对有限，新能源行业享受优惠税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而且需要政府提供补贴，从地方政府获取财政税收的角度难以解释地方发展新能源等新兴行业的动机。实际上，发展新能源背后还存在地方政府政绩宣示的动机。地方政府可能通过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来展示其对上级指示的贯彻落实，从而在政绩考核中获得优势，进而获取更大的利益。

（二）从经济周期看，国内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国际政治经济处于重构期，需求下行导致产能利用率和利润率下降

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进入增速换挡期，而非疫情期间才出现的。2010年经济增速换挡不是个简单巧合，与人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10年当时劳动人口占比达到74.5%的峰值，其后开始下降。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也开始下降，总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这种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引发了人口周期和房地产周期性的变化。房地产供需形势逆转，进入调整转型期，影响了房地产相关产业链，如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和利润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全球经济政治周期的变化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转向逆全球化，一些经济体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采取了不合理的打压措施，导致中国的外需受到一定影响，专用设备和计算机设备等产能利用率出现下降，引发“内卷式”竞争。

（三）从技术和产业发展规律看，技术迭代更新过程中需要多技术路线投资，产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供需错配问题，这更多是阶段性和结构性的

新兴技术和产业在发展初期，往往存在不确定的多种技术路线，每种路线都需要相应的投资。在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一旦新技术出现，旧技术路线的投资可能会迅速变得低效，甚至失去成本效益，从而形成无效或低效产能。然而，为了追求新技术，企业仍需不断扩张

新产能。这种发展过程本身就会导致产能扩张速度超过需求释放速度。在技术发展规律和技术迭代更新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鉴于技术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产能扩张问题，不宜采取大规模的行政干预或行政命令式的方法来削减产能。相反，应采取渐进的方式，“小步慢走”，以市场为主导，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给予更多时间和空间。

三、如何破除“内卷式”竞争？

1、以提振消费为抓手，全方位扩大内需

在宏观层面，供给与需求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基本框架。这一关系涉及市场与政府的互动，以下从几个维度进行探讨。

从需求端来看，应加强逆周期调节力度，提振消费需求和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一是可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并扩围至服务消费。二是财政政策应考虑从以投资为主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加大对特定群体的补助和支持，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并提振消费。重点关注三个群体：1）待业大学生和失业青年群体；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员；3）给二孩及多孩家庭发放生育补贴。三是深化财税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划分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释放消费和住房需求。

2、支持企业有序出海，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

近期企业家中流传“不出海就出局”，然而，盲目而快速地拓展海外市场可能会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的制造业具有强大的能力，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这是中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贡献。然而，未来的出口和海外拓展需要树立新的理念。这一理念应以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为目标，即中国的出口和企业出海不仅要追求自身的利益，还应致力于帮助当地经济发展。否则，可能会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产生更广泛的贸易摩擦，从而影响外需的扩大。因此，应从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推动出口多元化和企业国际化发展。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加速出口区域布局调整。企业出海与国际利益共同体构建方面，推动企业稳步、有序出海，将核心环节和高附加值环节留在中

国、将中低端产业链逐步移向中西部地区和发展中经济体，逐步扩大与广大“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通过金融政策支持、简化出海流程、提高境外投资服务保障等政策，积极支持出海企业做大做强。

3、平衡新型举国攻关体制与市场创新，优化供给结构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应对“内卷式”竞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涉及到地方政府是否应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以及其在供给和需求中的影响程度。在治理“内卷式”竞争的过程中，需要平衡新兴举国体制与市场创新之间的关系，以确保政府既能有效发挥其作用，又不抑制市场的创新活力。

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支持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以及为民营经济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的职能不在于直接干预市场，通过补贴等方式改变供需或成本收益关系以影响企业行为，而在于营造有利于创新和发展的宏观环境。科技创新单靠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政府需要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大环境，二是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然而，当前的局面是地方政府在科技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占比逐渐上升，而中央政府的支出比重则相对下降。这种趋势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能力和积极性不足，因为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地方政府投入的收益往往惠及整个社会，从而缺乏足够的激励去进行这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形势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因此，政府内部需要强化中央政府对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前端的支持力度，以改变目前中央与地方在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上的失衡局面。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企业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此外，还可以从供给侧加强产业政策引导，加大行业重组力度。一方面，提高技术标准，严控新增产能。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提高生产、技术、安全、能耗、环保、质量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水平，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能结构优化。另一方面，支持行业并购重组，畅通市场退出机制。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支持龙头企业对问题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改善供求关系，防止内卷式竞争。

4、优化地方政绩考核机制，改革行业自律机制

第一，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从比拼优惠政策搞“政策洼地”向比拼营商环境创“改革高地”转变，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长效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

第二，改革行业自律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为发展“协调器”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另一方面通过鼓励企业开展差异化竞争，找准自我定位，增强核心优势，开辟新赛道，开拓“新蓝海”，进入高水平竞争状态。

第三，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国央企做好表率作用，积极落实中央精神，响应行业协会的倡议。现实中，行业协会制定了行业参考价，但由于缺乏硬约束，不少企业并不采纳。同时，部分国央企采购方，仍延续低价中标的思维，忽视产品性价比，对行业协会的问询监督态度淡漠，助长行业“内卷式”竞争的氛围。

目前，行业自律机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国有企业参与招标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些情况下，招标规则倾向于选择报价最低的企业中标，这种做法使得企业为了免责而倾向于采取低价竞标策略。此外，某些地方的招标规定甚至要求投标价格不得高于某一设定值，而该价格有时低于企业的正常盈亏平衡点。因此，改革现有的行业自律机制，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把脉中国经济 传递中国声音
Taking Economic Pulse, Forecasting Economic Future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1104
Add: 1104, Lide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网站: <http://ier.ruc.edu.cn/>

微信公众号:

